

摘要

郭柏川（1901-1974）為台灣第一代赴日習畫的油畫家，並先後以東京、北京、台南三個城市為創作據點。其中，他的繪畫風格在北京時經歷轉型，是奠定其「紙上油彩」獨特作風的重要時期。但郭柏川滯留北京的時間與日軍佔領北京的時期重疊，其經歷在戒嚴時期較為敏感，故過去研究較少著墨於此關鍵時期。本文試圖透過報刊雜誌、日記等文獻材料，重建郭柏川自1937年至1948年在北京的經歷細節，以提供更多研究郭柏川畫業的線索。本文梳理郭柏川在北京的經歷，指出其得以在北京藝專任教，與日軍佔領北京後當地人才的空缺息息相關。本文將郭柏川在北京的藝術活動以1943年為界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。前期他不諳北京話，與日本、台灣人社群關係緊密，而日軍統治的文化政策也獎勵西畫在北京的發展；後期郭氏以「中國人」的身分組成中國新興美術會，並以創作能回應中國畫壇需求的新興美術為目標。

最後本文嘗試分析郭柏川北京時期繪畫的風格及轉變，如何回應日本、中國兩地近代美術的脈絡。透過將郭氏作品與影響其至深的岡田三郎助（1869-1939）、梅原龍三郎（1888-1986）的風格比較，本文指出郭柏川對「東方特質」表現和以宣紙作畫的嘗試，皆能從昭和初期的日本洋畫壇潮流中找到聯繫。此外，郭柏川學習在中國被高度評價的梵谷風格，回應中國畫壇對於「東方特質」的重視和鑑賞觀。中國觀眾也以具「國畫用筆」的眼光鑑賞郭柏川的繪畫，其評價延續並影響了後來台灣畫壇對郭氏風格的理解和定位。綜上所述，北京時期的郭柏川歷經風格上的轉型，在北京畫壇的活動與評價也對其畫業影響重大，是理解郭柏川畫業不可忽視的關鍵時期。